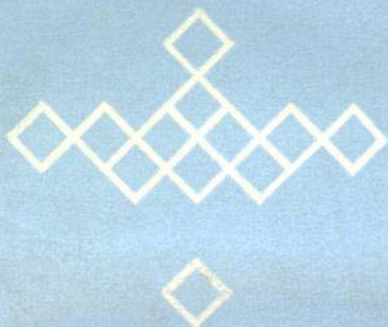




十年后的评说

——“文化大革命”史论集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十年后的评说

——“文化大革命”史论集

谭宗级 郑 谦 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十年后的评说

——“文化大革命”史论集

谭宗级 郑 谦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宝林排版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0印张 250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0 册

书号: 11310·35 定价: 1.75元

前 言

今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十个年头，又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站在今天的高度，努力开展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是这本论文集的出发点。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个十分奇特、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它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给数万万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和教训。它使“左”倾错误，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消极影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最典型的状态中认识它们。如同地震后的废墟是研究地壳运动的理想场合一样，“文化大革命”是可供我们洞悉不久前中国国情的一所以灾难为主要教材的大学校。

过去的十年，我国从“文化大革命”的自省和反思中起步，坚决拨乱反正，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这是举世瞩目的事实。然而，相对于全面改革的重大历史任务的要求，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所应提供的历史借鉴还远不深入，远不广泛。为了进一步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推向深入，需要更

广泛地收集、整理各种口头的、文字的史料，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从当代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等方面开拓研究视野，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心理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并积极借鉴当代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新方法。同时，也应注意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坚持研究工作的严肃性、科学性和纪律性。捕风捉影，杜撰虚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以个人的作风和品质取代对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或者斤斤计较个人恩怨，纠缠历史旧账等，都会把研究工作引上歧路。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与十年前相比，不论是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方面，还是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这对我们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研究“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新的视角。因此，我们是满怀信心的。目前，国外已有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撰写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著、文章，其中不乏中肯的见解，可供我们思考。但也确有许多臆测妄言。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会出现那种“文革”在中国，而“文革学”在国外的局面。随着我国政治民主日益健康发展，不久的将来，定会很有很多有志于“文革学”的朋友加入到这个研究领域的行列中来。我们热情地期盼着与所有这些朋友加强联系，共同切磋。

本书收集的八篇论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的几位中、青年专业党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在近两年中的部分研究新成果。这虽然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教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亡，党和人民的正义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期

间的经济状况等重要问题，都以较充实的材料作了认真的分析、探讨。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够有助于读者深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增强全面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五·一六通知》剖析谭宗级(1)

“文革”初期经济战线的严重斗争苏彩青(39)
——一九六六年冬季工交座谈会评述

林彪集团兴亡初探于 南(57)

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张沅生(102)
——一场反对“左”倾错误和对“四人帮”的
重大斗争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 化(141)

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及其历史教训陈雪薇(156)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建设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批判谭宗级(210)

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再认识郑 谦(237)

《五·一六通知》剖析

谭宗敏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从纲领来看，集中表现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上。

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它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内乱，一种自己毁灭自己的自杀行为。指导这场“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个集中代表“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它是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的继续和恶性发展，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产物。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文件，把它推向极端，持续危害十年之久，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对《五·一六通知》的剖析，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问题：一、《五·一六通知》发表时的历史概况；二、《五·一六通知》是“左”的理论、方针、政策的集中表现；三、《五·一六通知》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

（一）《五·一六通知》发表时的历史概况

《五·一六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展开，正如毛泽东同

志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斯诺时说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这里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就是指《五·一六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倒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此，进行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

批判剧本《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序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写作和发表，是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准备，经过毛泽东同志批准的。事关“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这样严重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竟然完全不了解。

吴晗同志（1909—1969.10.11）是平白无辜的受害者。他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市副市长、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发表的有关海瑞的文章和剧本，是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而写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谈到生产指标过高，有的同志不敢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毛泽东同志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他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现在缺少海瑞。一次，毛泽东同志看湘剧《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剧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他把《明史·海瑞传》找出来看，随后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说这个人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者，家家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帝死了。他大哭一场，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讲了以后，还把《明史》给了彭德怀同志看。毛泽东同志又讲，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胡乔木

同志把这个意思传达给吴晗同志，建议他写些海瑞的文章。吴晗欣然应命，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九月，又写了剧本《海瑞罢官》。时值庐山会议闭幕，会议错误地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吴晗与彭德怀同志原来既无工作联系，也素无私人交往。由于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和对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恐惧心理，特地在《论海瑞》一文的末尾捎上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示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同志“假冒”海瑞划清界限。显然，这些题外的话用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吴晗是想为一篇又一篇的海瑞文章避嫌，为自己挖了一条防空壕。继《论海瑞》之后，吴晗还写了《海瑞的故事》等几篇文章，很受读者好评。剧本《海瑞罢官》是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约请而写的，最初剧名定为《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同志建议，为了同其它海瑞戏相区别，第四稿才改题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剧本发表并演出，受到群众欢迎。以上情况说明，吴晗写《海瑞罢官》完全是凑巧的机会促成的，并非有意和庐山会议联系，为彭德怀同志翻案。

江青批判吴晗，则是有组织、有计划选择的一个反党乱国的突破口。早在一九六二年，江青找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但是，江青并不甘心，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又找人民日报社李希凡同志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加以谢绝。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窜到上海，与张春桥拍板成交，非法搞了一个同中央并行的、背着中央的秘密集团，施行“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的诡计。同年八月底，定下以批“退田”联系“翻案风”、“单干风”的文章主题。为掩人

耳目，写出的批判稿都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直送北京江青处，鬼鬼祟祟，约定向周恩来同志（中央常委中分管文艺）封锁消息。文章写成后，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不在《人民日报》发表，而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然后观察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否转载。很明显，文章不是作为文化问题、限于一个剧本来进行讨论，而是针对北京市委、针对党中央，作为全局性问题提了出来。姚文元的文章出笼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认为姚文元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央并没有通知各地转载，《北京日报》可以不转载。中共北京市委调查了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证明吴晗历史清白，为保护吴晗作了政治准备。由于北京市的报刊十几天不予转载，发难者要出版小册子，以扩大、加强攻势。当时北京新华书店接到上海新华书店一个征求预订的电话，根本没有向北京市委打招呼，北京市委理所当然地置之不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并加了按语，这是经周恩来同志修改过的。其中大段引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讨论问题应采取“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周恩来同志曾对吴晗说：“吴老晗，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发展，这种保护措施没有得以实现。在江青组织策划下，又接连发表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载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关锋和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五期，四月五日出版），把吴晗同志在庐山会议前后写的作品，都同彭德怀同志罢官一事生拉活扯地联系起来。《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突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立即具有“反党”性质。这样，对曾经保护过吴晗的中共北京市委进行全力打击，就有了突破口。紧接着，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

《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刊载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一文。同天，《光明日报》也在显著地位刊登署名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又抛出《评“三家村”》一文。此文是江青、张春桥直接掌握写成的，从上海发稿，要全国各报刊登，传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人民日报》刊登时不许错一个字，如有差错，以总编辑是问。同天，戚本禹抛出《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这几篇文章交织成一张猛烈的火力网，矛头直指北京市委。这样，把邓拓、吴晗同志迫害致死，把廖沫沙同志投入监狱，也把彭真同志打倒了，并使北京市委陷于瘫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红旗》、《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指出：“《五·一六通知》揭露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使这个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一语破的。因为江青组织姚文元写文章时，“斗争”目标早已预定，而吴晗不过是一系列突破口中的第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则是康生最先提出来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同志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五日，在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自己也说：“六四年的时候，我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六月三日，康生同越南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再一次阐明他的观点：“我曾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他提出退田分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单干”。江青抓住《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大做文章，完全是由“斗争”目标需要而选定的。江青曾经洋洋得意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

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十分明显，为了打倒刘少奇必须先打倒彭真，为了打倒彭真就要从吴晗开刀，这是江青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斗争策略。只要达到这个既定目标，就可以不择任何手段。这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做的一切，也是他们把这个问题写进《五·一六通知》的用意所在。

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江青和林彪相互勾结，由江青出面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等进行座谈）。根据这次座谈会整理而成的《纪要》，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种谬论全盘否定我国三十年代文艺的重大成就，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把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黑线统治，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

二、打倒彭、罗、陆、杨，为开展“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扫除障碍

林彪经过精心密谋策划，由叶群向毛泽东同志诬告罗瑞卿同志“逼林彪让位”，“有篡军反党的野心”。然后，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间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进行毫无根据的批判。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下，彭、罗、陆、杨四同志被打成“反党集团”。经过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罗、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并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不正常关系”。这样，彭、罗、陆、杨就作为“反党集团”打倒了，扫除了林彪、

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

三、《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和发表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剖析《五·一六通知》，必须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谈起。

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确切时间待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了一天会，对批判吴晗同志的情况及继续批判问题进行讨论。与会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住院开刀，未参加），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十一人。会议由彭真同志主持。早在这次会议以前，康生就已授意关锋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文章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的。当时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彭真同志也说了查不到吴晗同志与彭德怀同志有什么联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讨论中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康生当时并未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不管怎样，关锋的文章修改后可以发表。许立群、姚溱同志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于二月七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纲》共分六点：第一点讲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第二点讲方针；第三点讲队伍；第四点讲左派要互相帮助；第五点讲准备工作；第六点讲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二月提纲》阐述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根本问题。其中关于

当前学术批判的性质和目的，《提纲》指出，以批判《海瑞罢官》、“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等为内容的大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方针，《提纲》指出，要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说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列主义的东西）都充分的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的驳倒和摧毁他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关于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它规定要“慎重”。关于队伍问题，《提纲》说：“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同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左派要整风的指示，提出了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的警告。如上所述，《二月提纲》除了把学术讨论的性质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显然是“左”的错误而外，其他关于解决学术讨论问题方针、政策的规定，还是比较符合解决学术问题的规律的，这与康生、江青等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扼杀和摧残学术的恶劣行径是截然不同的。总之，《二月提纲》只不过是试图把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批判略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中央的领导之下而已。

《二月提纲》原是向中央汇报用的。二月五日，彭真同志和康生等先向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大家都同意。二月

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胡绳、许立群等到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对中共中央宣传部搞的有关何明（即关锋）的文章和材料表示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还不错。左派的问题以后再说。在汇报中谈及“郭（沫若）老、范（文澜）老要保护，不要批评”。毛泽东同志说，郭老、范老当然要保护，但是，他们两位还是要在史学界工作，有个适当的自我批评表示为好。毛泽东同志问：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同志回答说，他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那一边。毛泽东同志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康生后来诡称，《二月提纲》是背着 he 搞出来的。其实，他既参加了事先的讨论，又参加了对中央的两次汇报，并未有任何反对意见。彭真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同志表示，同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同意林彪的“顶峰”和“最高最活”一类说法，要彭真和康生去上海期间，顺道到苏州同林彪谈一谈。二月十二日，彭真、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到上海，把《二月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没有异议。《二月提纲》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过后，于二月十三日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不久即被毛泽东同志指为“修正主义纲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康生到上海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我们党同一个外国共产党的会谈情况，说两党联合公报已经商定，对方坚持不点名批判苏共的一些观点，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了。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这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了。毛泽东同志还对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常委作出的别的决定表示不满，如关于一个外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发来邀请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先是不置可否，要在京中央常委讨论。中央常委提出应邀参加，坚持原则、进行斗争的方案。毛泽东同志予以

否定，于三月二十四日公布中共中央不派代表团参加这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公告。康生在国际问题谈完后，乘机告状，说彭真同志于三月十一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在康生的挑动下，毛泽东同志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毛泽东同志针对彭真、陆定一同志讲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康生于三月底回到北京，即向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并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材料，作为他四月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报告的蓝本。康生传达说，主席说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康生的传达，既有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有他自己的话，也有他理解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话，混杂不清。根据康生的传达，康生要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宣布《二月提纲》作废。通知初稿写出后，毛泽东同志认为写得太简单，不能用，指示陈伯达主稿，另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陈伯达找王力共同起草，送毛泽东同志修改审定。康生说，光有通知不够，还要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下发。以后成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即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两个文件都由起草小组执笔，通知以陈伯达为主，大事记以康生为主，实际上都由江青主持。康生说，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吴冷西开脱一下。王力深知其意，首先是给康生开脱。王力就在“大事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这完全是为康